

巫宝三著

# 管子经济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 092.2/5

75897

# 管子经济思想研究

巫宝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北京

责任编辑：李若愚  
责任校对：王 新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王丹丹

**管子经济思想研究**  
**GUANZI JINGJI SIXIANG YANJIU**

巫宝三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308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004-0110-8/F·30

定价：5.05元

## 内 容 提 要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总论〈管子〉一书的经济思想，中篇分论〈管子〉书中重要经济思想篇章，下篇专论〈管子·轻重〉诸篇的若干问题。这些文章是专题研究性质，所以各自有其独立性；但是，它们又是根据预先拟定的计划撰写的，所以又不失其系统性和全面性。

多年以来，研究〈管子〉一书的专家学者和他们的论著甚多，作者在领悟原作的基础上，对别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审慎的比较鉴别，有取有舍，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DH42/09

## 前 言

本书由十篇论文组成，分为上、中、下三大篇。上篇总论《管子》一书的经济思想，有专文一篇；中篇分论《管子》书中重点经济思想篇章，有专文五篇；下篇专论《轻重》诸篇的若干问题，有专文四篇。这些文章是专题研究性质，并非依次完成，有它的独立性，但它们也多少是根据预先计划而写的，所以主观上还是使本书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本书十篇中，除第一、三两篇是新近完成，第六篇是旧作，尚未发表外，其余七篇都先后在各期刊上发表过，发表的期刊和年份注于各篇文之末。这次收集这七篇文于本书，除改正文字上一些刊误外，还对《侈靡》篇一文加了一个《附记》，并对《侈靡》篇注释和今译的个别文句作了改正。

《管子》一书从书文校勘到各篇思想，问题最多，中外学者一直在进行研究，特别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有较多的著作出版，这是可喜之事。本书之作，只是从经济思想方面进行探讨，提出一些见解，谬误之处，尚请读者正之。

1986年11月11日

# 目 录

---

## 上 篇

- 一 《管子》经济思想总论  
——《管子》的封建社会国家经济论…………… 1

## 中 篇

- 二 《乘马》篇经济思想的研究…………… 70  
三 《问》篇关于土地制度和社会生产的思想…………… 109  
四 《度地》篇和《地员》篇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意义及其农学思想渊源…………… 122  
五 《侈靡》篇的经济思想和写作时代…………… 143  
附：《侈靡》篇注释和今译…………… 172  
六 《国蓄》篇经济思想研究…………… 218

## 下 篇

- 七 《轻重》各篇的经济思想体系问题…………… 254  
八 《管子》轻重学说的渊源、基本思想和基本概念…………… 277  
九 《管子》的货币、价格学说与政策…………… 309  
十 《轻重》十六篇的成书年代问题…………… 367

# 上 篇

## 一 《管子》经济思想总论

——《管子》的封建社会国家经济论

### (一) 引 言

我已写了若干篇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专题论文，这一篇是在于总述《管子》经济思想的全貌，一方面可以把《管子》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突出起来，同时也可以把专题论文所未涉及的方面包括进来。当然，这篇所述难免与专题论文所述有某些重复的地方，但是这篇与专题所论述的角度不同，把二者合起来看，有时对于所论述的问题可以互相补充。

这篇标题所以加了副题“《管子》的封建社会国家经济论”的原因是，(1)《管子》一书是一部著述汇编，它所论述的经济问题甚为广泛，凡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出现的经济问题，它几乎无不涉及。可以说，终我国封建社会时期，这是一部论述封建国家经济问题最为全面和最为丰富的著作。(2)由于《管子》论述经济问题是从封建国家经济出发，它的论述几乎全部是宏观的，即对某一经济问题的见解、分析、主张和政策，都是按封建国家的范围和要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很少有就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如农户、手工业作坊、家庭消费的范围进行论述和分析。后一种论述和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即使有，也是论述宏观经济对于个体生产的影响和作用，而不是专从个体单位分析它的经济活动的。如它也有对于个人欲求，以及“民富”、“百姓富”的论述，但论述这些问题，都是从加强封建国家经济的要

求出发的。所以《管子》的经济论述，十分清楚地表明它是一种关于封建国家经济论述的性质。这并不是《管子》经济思想专有的特点，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所有思想家的经济思想都具有宏观思想的特点。我国最早的经典，如《尚书》、《周礼》，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论述，都是以君国为主体。不过如上所述，《管子》关于封建国家经济的论述较为全面，它对中国古代宏观经济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管子》的封建社会国家经济论有没有确定的体系呢？从《管子》一书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来看，显然它的论述不可能有确定的体系。《管子》一书除《轻重》诸篇比较集中论述商品货币经济问题而外，其他论述经济问题的篇章，多兼论哲学、政治及军事等问题。很难从《管子》各篇论述经济问题的次序和逻辑，找出《管子》有一粗具体系的经济论述。不过，如果我们整理一下《管子》各篇所论述的各种经济问题，未尝不能从中找出有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虽然散见于各篇，并且各篇非出自一人，但这些篇文的作者同是管仲功业和思想的歌诵者，同属于管仲学派，因而他们对于各个方面问题的论述，会有共同的思想贯穿其间。从这个方面来考察，就可以从《管子》对于各个方面经济问题的论述，找出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在概述《管子》经济思想全貌时，力求探讨《管子》经济思想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和基本论点，从而找出《管子》经济思想的特点及其对于古代经济思想的贡献。我也想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几个方面来整理《管子》各篇的经济论述，但为了避免先定框框的毛病，现在还是根据《管子》所提出的论述来进行整理和分析。虽然古代思想家的经济论述也离不开生产、交换等方面的问题，但例如近代意义的利润和工资，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因而以近代分配论来考察古代分配思想就不恰当。按《管子》实际所提出的经济论述来整理它的思想材料，可以避免套用近代经济理论的毛病。

## （二）《管子》一书的特点和所属学派

这本书讲的是《管子》经济思想，但《管子》一书并非全部是经济思想。按郭沫若的说法，“《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sup>①</sup>既是战国、秦、汉文字总汇，它所包含的就不是一个时期和一家和一个方面的思想，而是不同时期和多家、多方面的思想。这是《管子》一书的最大特点。了解这个特点，对于研究《管子》一书的经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想在讲《管子》的经济思想之前，先对此书作一鸟瞰，简述构成此书特点的主要内容。其次，《管子》这部书内容既丰富，其中不少篇章文字又有错乱，难以通读，因此我国自唐代迄今，即不断有学者对此书进行校勘、注释和研究，日本和西方亦从十八世纪以后，有学者不断进行研究，而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外都有更多注释和研究著作涌现，其中包括经济思想的研究。对于这种研究发展状况，将在本书各篇中有时提到，在此不作系统介绍。

《管子》原有八十六篇，以后在流传中遗失了十篇，现存七十六篇。这七十六篇中绝大多数属于政治和经济思想著作，但也有一些篇很明显地是哲学著作，以及军事学、农学，和论述自然现象的著作。所有这些著作，汉代编者刘向托名于管仲，其中有些篇虽然有管仲的遗教及政教思想影响，但显然不可能是管仲的著作，并且也不是管仲以后某一人的著作，而是成于许多人之手的著作，在著作的时代上，随之也有先有后。《管子》书的这种独特情况，已为研究者所公认，无庸重述。现在所要说明的，是这一著作在学术思想上有何特点，彼此有何联系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如何。管仲被认为是法家的先驱；《管子》一书中很多篇被认为是法家著作，因而从《隋书·经籍志》起，改变了过去

<sup>①</sup> 郭沫若：《管子集校》，《校毕书后》。

《汉书·艺文志》列《管子》为道家的说法，以后即把《管子》定为法家。固然《管子》一书中的政治思想，与商鞅、韩非的法家有很多共同之处，如重君、重令、重农抑商等，但也有不同之处，如《管子》同时重民、重礼义、重视宗族制度等。这从“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两句名言中，特别提出“礼节”，提出“衣食足”，已经多少表示出来。所以最近一些学者，如冯友兰认为《管子》的哲学、政治思想属于不同于三晋法家的齐法家，①余敦康认为《管子》的哲学、政治思想特点可以构成为管仲学派。②美国学者李克（W·A·Rickett）近著《管子》一书，亦赞同上说，但认为如果名《管子》为“实在论者”（Realist）或较合适。③总之，《管子》的政治思想或全书的思想，既未可以道家思想概括（不可否认它有道家思想，下详），亦未可以商、申、韩法家思想来概括，它是在传授和阐发管仲思想并且是在齐国的具体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但是，《汉书·艺文志》列《管子》为道家，不是没有根据的。《管子》中有很突出的几篇哲学论文：《心术上、下》、《白心》、《内储》、《枢言》，郭沫若说是宋钘、尹文的遗著，是道家黄老学派的著作，④但有人如冯友兰等则说是稷下唯物派著作，“是道家思想向法家过渡”，并说不一定就是宋钘、尹文所著。⑤不管这几篇是否为宋钘、尹文所著，这几篇属于哲学著作，属于黄老学派的著作，则是为学者们所公认的。这几篇著作由于它专门论述哲理，看起来似乎与其他篇文不大协调，是《管子》书中独立的一个部分。不过放大来看，这几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② 余敦康：《论管仲学派》，《中国哲学》第二辑。

③ Rickett, W. A. *Guanz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vol. one. 1984.*

④ 《宋钘尹文遗著考》，载《青铜时代》。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新编》。参看萧蓬父等编，《中国哲学史》。

篇的哲学思想与《管子》的政治经济思想不是毫无联系的。相反，这几篇正是《管子》政治经济思想的最高概括。这几篇强调道家的“无为”、“虚静”，但同时也强调“法”，强调“权”。《心术上》说，“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管子》这几篇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在于强化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与《管子》政治经济的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再说，《管子》中还有几篇阴阳五行家的著作：《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这几篇著作也自成体系，在《管子》书中象哲学几篇著作一样，也颇突出。对于这几篇著作的理解，首先要区别先秦原始科学的阴阳五行学术思想与汉代讖纬迷信的阴阳五行说不同。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代思想家对于自然界现象的探索和理解，简括地说，即用阴阳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变异，如说地震是由于“阳伏”和“阴迫”之故。<sup>①</sup>而“五行”，是说自然界各物的运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在起作用的。如宋子罕对宋君说，“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并用之，废一不可”。鲁大夫展禽说，“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sup>②</sup>这些说法，都是古代思想家对于自然界物质运动所作的解释，具有原始科学的意义。上述《管子》四篇阴阳五行家著作，就是在这种学术思想基础上联系农业生产及政教措施而所作的论述。如《四时篇》说，“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是阐明农业生产活动的规律。“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谗则生祸”，是阐明政教措施要符合春、夏、秋、冬四时的物质运动。这些论述初看起来，好象与《管子》政治思想不相属，细加追究，则它从自然现象的活动和变异，来论述农业生产和政教措施的客观要求，实在是《管子》重农、重君、重民等政治经济思想从自然现象方面所作的论证，它们之间

① 参看《国语·周语》。

② 《左传》，襄27年；《国语·鲁语》。关于古代阴阳五行说，请参看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一文，《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3月。

是有密切联系的。刘向为什么要把这些篇文编入《管子》一书，道理恐怕在此。

另外，《管子》还有两篇农学论文，一是《地员》，一是《度地》，前者是讲土壤与植物生长的关系，后者主要讲水流的整治与灌溉工程。二者虽然都是科学技术性质，但它对发展农业生产力很重要，并且就战国时代来说，它的科学思想还是源于阴阳五行家和道家的学说。所以《管子》中有这两篇科技论文，也不为无因的。至于军事学论文，如《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等篇之在《管子》书内，则道理更为显然。因为如司马迁所说，管仲相齐的功业，是“通货积财”和“富国强兵”，管书作者当然不会离开“强兵”这个主题。

至于经济思想，本是《管子》主要内容，但论者亦有谓《轻重》十六篇（原为十九篇，佚三篇）是汉人所增，而“与《管子》其它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sup>①</sup>对于此说，我有专文驳其非（载本书），不在此重复了。

《管子》在先秦诸子中，思想内容最为丰富，但亦最欠条理。上文是就各篇思想内容而言，若就原书各篇划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轻重”八大组别来说，除“经言”、“管子解”、“轻重”三组篇文性质较为一贯外，<sup>②</sup>其他各组分组的意义实在不大清楚。如“短语”一组篇文，包括主要哲学及军事学各篇，其中《侈靡》篇是《管子》中最长篇文。所谓短语，真不知编者之意何指。再如《管子》在《汉书·艺文志》只说86篇，不言多少卷，从宋以后都分为24卷，但《隋书》、《新唐书》则说是19卷，如何由19卷变为24卷的过程，现在还不清楚。而各卷之分，亦缺乏原则。如《牧民解》与《地员》等篇合为一卷，《立政九败解》与《轻重》头三篇合为一卷，看来这种分卷并非

① 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论》上册，《论管子轻重上》。

② 《轻重》16篇中的《轻重己》一篇所论重点，亦与其他15篇有异。

根据一定原则。那么，它的分卷原则为何？很难解答。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实质性的，但也说明《管子》一书有待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

### （三）《管子》经济思想的产生

《管子》经济思想的产生有二大来源，一是管仲的治国功业和政策思想，二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变革中所产生的思潮。

如前所述，《管子》一书是学者所崇奉大政治家管仲治国功业和政策思想而著述的论文汇编，而它的经济思想则是对管仲经济思想和政策的阐明和发扬。因此《管子》经济思想的产生，应从管仲的经济观点和政策说起。根据《国语·齐语》、《管子·大匡·小匡》、《史记·齐太公本纪》、《管晏列传》等历史记载，管仲相齐桓公时的政策纲领是“作内政而寄军令”。所谓“作内政”，就是制定安民富国政策，“寄军令”或“寓军令”，就是治国政策当中的强兵措施。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的“富国强兵”的农战政策，应即渊源于管仲。司马迁说管仲在齐国所行的政策是“通货积材，富国强兵”，把“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涵义明白地揭示了出来。关于“作内政”和“通货积财”的具体经济内容，上述材料还有记载。其一是管仲对于物质财富生产的基本认识。《史记》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话是管仲所说。《管子》首篇《牧民》也记载了这两句话，一般对于《史记》这一记载都无异议。这两句话表述了物质生产对于精神和观念的作用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要性，非常精辟，不但为后来《管子》作者们所传诵，并且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奉行的格言。其二是提出“四民”分业说。管仲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囋（móng，忙，言语杂乱），其事乱”（《小匡》。《齐语》同。）管仲说这是“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政策。按“四

民分业”说是继农业与手工业分工之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出现的商人活动的反映。管仲相齐时是在公元前七世纪春秋初期，一般来说，私人商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尚属偶然现象，不过齐国地处海滨，人民有经商传统，管仲敏锐地观察到手工业和商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突破了过去“君子”与“小人”、统治者与生产者的社会分职论，而主要从社会经济活动来论述四民分业的重要性，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最早提出的农工商经济活动分工论，<sup>①</sup>以后一直为《管子》作者所遵引，如在《乘马》、《治国》二篇中，都明确地提到四民分业。《管子》在《轻重》各篇对商人活动还有更多论述。其三是关于租赋改革。《大匡》篇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取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所谓“案田而税”，实即按亩征税，征收实物地租，废除劳役地租。桓公十九年早于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八十一年，是齐国的“税亩”早于鲁国的“税亩”八十多年。“税亩”是春秋时代废除“公田”和劳役地租的一项重大改革，应成为管仲“作内政”的中心内容，它对于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有重大作用。可惜留下史料很少，并且此“案田而税”的重要记录，常为史家所忽略。此外，管仲还进一步提出“相地而衰（音崔）征”的政策措施，即按土地的肥瘠征收不同租税，而不是不问土地好坏征收同等租税。这项措施，不言而喻，是在“税亩”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没有“税亩”的改革，不可能有“相地衰征”的改革。管仲是十分重视“相地而衰征”的改革的，他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齐语》、《小匡》）。他明确地说出了这一改革措施对于激发生产者积极性的

<sup>①</sup> 《周礼·考工记》对全社会分业提出“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归功”六职之说，除“王公”、“士大夫”二职属于政治范围，其他四职与管仲的工农商相同。《考工记》成书年代，其说不一，大致从周初之后，农工商分业之说已逐渐出现。

作用。管仲这一在封建社会具有中心意义的租赋政策思想，后来在《管子》书中亦被继承而加以阐发。其四是管仲重视工商业和货币的作用，即《史记·平准书》所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管子》有《轻重》十九篇（亡佚三篇，今存十六篇），除《轻重己》篇而外，多论商品流通和货币价格问题，其渊源于管仲的思想，甚为显然。以上所述管仲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实践的成就，很自然地成为以后学者议论各种经济问题的思想材料，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变革的战国时代，各种新出现的经济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要求人们重新思考。

《管子》经济思想产生的又一来源，是时代的各种变革。这是《管子》经济思想产生的动力。从春秋诸侯争霸到战国七国争雄这一时期，各国相率变法，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改革，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其中著名的，在魏国有李悝的变法，实行“尽地力之教”，以发展农业生产，并实行“平籴法”，以稳定粮食价格。在楚国，楚悼王起用吴起，实行对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以裁汰“不急之官”，并实行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以开发荒芜地区。在齐国，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实行“修法律而督奸吏”的政策，奖励“田野辟，民人给”的即墨大夫，惩治“田野不辟，民贫苦”的阿大夫，由此而“齐国大治”。在秦国，则有著名的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重农抑工商、变革田制（“开阡陌封疆”）和军赋制度（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设置郡县行政制度等，为秦国奠定以后统一六国的基业。此外，赵国亦实行“任官使能”和“节财俭用”的政策，韩国起用申不害为相，主张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认为国君要用“术”治，使“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以上这些变法改革，都为《管子》作者们提出了崭新的思考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改革，原为贵族下层而身通“六艺”的“士”越来越受到各国国君的重视，他们常常招徕和敬重贤士，以进行改革工作。因而在战国初期，就出现了布衣卿相

之事和“礼贤下士”之风。由于“士”的作用的增加，“士”这个阶层空前地活跃起来。在春秋晚期，孔子已经聚徒讲学，有“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随后墨翟也聚徒讲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此外尚有老庄的道家学说，申、商的法治学说，以及名家、阴阳五行家的学说。各家学说纷纷出现，逐渐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齐国在国都临淄设立稷下宫，招徕各国学士，给以优厚待遇，使其著书立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策，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些学士来自各国，其中有道家、阴阳家、法家，稍后来稷下的还有驺奭、荀卿（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则为著名儒家。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学术昌盛局面，在齐国稷下表现得最为特出。既然各家学说都在稷下研讨议论，可以设想，以管仲思想与功业之隆，亦必受到当时学士们的极大重视，而思图加以阐发。《管子》书佚作者名，现存《管子》虽系汉代刘向编，但在韩非之时，已见有《管》书流传（《韩非子·五蠹》篇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则韩非所说的《管》书必作于战国时，而最大可能性是成于稷下学士们之手。因此后代研究《管子》各篇作者及时代问题，虽然存在重大争议，大多学者都认为是稷下学士所作。

#### （四）务本论和富国论

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生产是最为重要的。分配决定于生产，交换和消费也以生产为条件。在古代社会，农业是社会生产最主要的部门，所以古代思想家的生产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管子》也不例外，它的“务本”论，所论也主要是农业生产。同时，《管子》和其他法家一样，它的“务本”是和“富国”密切

联系的。务本是手段，富国是目的。韩非所说，“富国以农”（《五蠹》篇），也是《管子》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当然，《管子》所论有它自己的特点。兹从以下各要点论之。

### （1）财富观

管仲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是《管子》各篇的指导思想。《管子》第一篇《牧民》，即提出这两句话并加以阐述。稍加分析，即可知道，这两句话的前半句，是说国家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人民要有足够的衣食供应；这两句话的后半句，是说物质财富的生产是政治教化的基础。从这两句话，可以知道《管子》对于衣食等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何等的重视。

《管子》重视物质财富生产的立足点，是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一切古代思想家的共同思想，但法家则赋予它在政治上更为重要的意义。《管子》重视物质财富生产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论点，有与其他法家相同处，也有《管子》独自提出的论述。试与《商君书》对照，在论“多粟”的重要性上，《管子》《权修》篇和《治国》篇所论述的，与《商君书》基本上一致，特别《权修》篇的“壹民”说，与《商君书》的语言也完全相同。其次，《管子》《牧民》、《重令》诸篇不单重视五谷的生产，还特别提出桑麻的种植和六畜的繁殖。这也与商鞅法令“耕织多者复其身”之意相合。但《管子》在财富以至富国问题的论述上比其他法家都全面而具体得多。此可于《立政》篇的论述见之。

“君之所务者五。……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  
沟洫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  
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

上文列举了“国之富也”的农、林、畜、果菜、水利工程、工事、女事六个方面，实包括了古代社会的全部物质生产。这里特